

彭康留日求学经历小考

郑海洋

一、前言

在西安交通大学 120 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彭康无疑是一个重要名字。在学校西迁的关键历史时刻,他担当了这艘大船的最为合适的掌舵人,他的努力为日后西安交通大学立足西北,获得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青年时期彭康 8 年的留日经历是他个人成长的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由于各种原因,无论国内甚或国外,彭康留日时期的资料已经很少,近几年在西安交通大学相关部门(校史中心、国际交流处、校友部等)、西安交通大学日本校友会 and 京都大学等有关人士的协助下,新近发现了一些彭康留日时期的资料。本文试图在对国内现有资料再挖掘的基础上,结合最新发现的日方资料,从彭康留日时期的学校和师友关系等入手,探究彭康真实的留日生活。

彭康,江西萍乡人,学名彭坚,曾用名彭子劫、彭嘉生,是创造社后期主要撰稿人,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是交通大学西迁丰碑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开创西安交通大学千秋基业的基础带头人。1901 年 8 月 26 日彭康出生在江西萍乡,他从小劳动,学习刻苦、成绩优秀,经祠堂小学进入萍乡中学。1918 年秋留学日本,经补习语言和数理化后,进入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并获取官费名额,后考入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1927 年秋返回上海,1928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

在日本留学期间,彭康从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再到京都帝国大学,几乎环绕了大半个日本。历程为何如此复杂?他是如何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因而走上革命道路?为探寻原因,从其留日求学经历进行追寻。

二、负笈东渡

1913年,彭康考取萍乡中学。萍乡中学当时汇聚了一批学识广博、教育经验丰富的老师,如英文教师俞其辉、数学(代数、几何)教师孟琦、地理教师黄道腴、中文教师李迪初等。在这样的环境中,彭康的各学科成绩都不错,尤其是英文。

江西地处内陆中部,是东南沿海和内陆交通必经之地,与安徽、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省毗邻,对外交流比较活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运动活跃,人才辈出之地。江西人留日,由来已久,早在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的1905年前后,就有很多人加入到了中国近代早期的留日大潮。1905年到1909年间约有50位江西留学生在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办的弘(宏)文学院学习。1906年12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就有萍乡上栗留日学生蔡绍南、林中幹、肖菁莪、梁松操、刘渭璜等人参与组织。敢为天下先的风气在辛亥革命后还一直延续。1908年(明治41年)第一高等学校开设预科时,胡庭枢、熊正渲、张惟和、王修瑾等江西籍留学生在学。萍乡地区名校萍乡中学更是早就有人留学日本。张有枢、李隆都已经在1917年考入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拿到官费名额。两位先期赴日的同乡前辈的“成功”经验,显然对彭康下决心留日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经济上还是很拮据,但有两位大哥的照顾,加上自己一直以来成绩也算优异,彭康自己对留日应该还是很有底气的。

因此,1918年夏,即将中学毕业的彭康在姑表兄张有枢鼓励帮助下,由本族祠堂筹措经费,随亲戚李隆前往日本求学。

三、近代中国留日学生求学学校情况

(一)旧制高等学校

1886年(明治27年),明治维新之后,为配合建立天皇绝对权威的君主立宪制,日本首任文部大臣文相森有礼(1847—1889)接连颁布了帝国大学令、中学校令、师范学校令等,开始推行教育制度大改革。旧制中高等学校即是根据中学校令设立,其目标是“培养上流的人,如做官就是高等官,做商业者就是理事者(注:管理人员),做学者就是学术专攻者的左右社会多数人思想的人物的地方”(森有礼)。二战前,日本国民教育体系大体分为“正系”和“旁系”两个系统,“正系”位于顶端的是帝国大学和高等学校(大学预科),往下为中学校和小学校;“旁系”由高等师范学校和初等师范学校构成^[2]。1894年,日本政府颁布第一次高等学校令,旧制高等中学校从中学校独立出来,改称旧制高等学校。到明治末年为止,日本全国有一高(东京,1886年)、二高(仙台,1887年)、三高(京都,1886年)、四高(金泽,1886年)、五高(熊本,1887年)、六高(冈山,1900年)、七高(鹿儿岛,1901年)、八高(名古屋,1908年)8所高等学校。历史上,为把它们和后来大正年间设立的以地名命名的高等学校区别开来,往往以数字高校(number school)来指称其名称。

根据高等学校令,旧制高等学校是教授专门学科的地方,可以设置为考入帝国大学的大学预科。最初,各高等学校同时设置医学部和法学部等专门部以及大学预科,之后专门部慢慢废除或者独立,高等学校实际上成了纯粹的大学预科。说起与帝国大学的关系,高等学校是唯一的帝国大学预备教育机构。究其原因,一是各高等学校根据学生志愿考的分科大学分成三部(第一部是法科及文科志愿,第二部是工科、理科及农科志愿,第三部是医科志愿),从这样的学科设定可以看出高等学校作为大学预科的定位。二是进入高等学校就相当于拿到了进入帝国大学的保证。帝国大学的入学资格限定在高等学校毕业生,只有有缺额了才会允许被认定为和高等学校同等学力的学生入学。高等学校和其他各教育机构比起来,在进入帝国大学上有绝对的优先权。从高等学校大学预科升学是进入帝国大学的正统路线,而专门学校和师范学校等各学校学生考入帝国大学只能靠旁门左道。旧制高等学校制度一直延续到1950年(昭和25年)才被废除。

当时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进入日本精英教育机构学习,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进入高等学校预科,实质类似进入了日本培养社会精英的快车道,有了进入帝国大学的基本保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高等学校可以无忧无虑。虽然高等学校提供给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学生同样的教育环境和机会,但三年内所修外语科目除了日语,还有英语、德语,甚至拉丁语,再加上基础专业

课学习,学生面临的压力也可想而知,其痛苦不言而喻,如郭沫若等人回忆这段留学生活都叫苦不迭。留学生和日本学生同等对待,每年2次考试和升级等,不小心即有留级或被除名的危险,高等学校的留级率大概10%—50%,2年连续留级就要被除名。1919年一高三学年本科21名留学生中有4人1次考试不合格,3人因2次考试不合格被除名。当然,这不限于中国留学生,日本学生也有被留级或除名情况。

(二)五校特约

为纠正清末留日大潮下早期“速成式”日本留学的各种弊端,“五校特约”应运而生。在清政府明令停止速成留学生派遣的背景下,1907年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协商签订了留学生培养协议。根据协议,从1908年开始由文部省直辖5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每年25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每年40人)、千叶医学专门学校(每年10人)、第一高等学校(每年65人)、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每年25人)承担留学生教育任务,实施期限15年,费用由中国地方各省分担,每年通过考试选拔165名学生入学。此后,虽然国内经历辛亥革命政权更迭,“五校”有所变化,新生的中华民国依然按约定执行该协议,直到1922年特约期满。考进五校的“官费生”每月经费均为33日元,一直未变。据官费留日学生黄尊三日记记载,当时日本三口之家,每月24日元开销生活已足矣,由此足见当时“官费生”待遇很优厚。

第一高等学校作为唯一一所“五校

特约”中的旧制高等学校,因待遇优厚,加之进去即等同于保送帝国大学,所以每年考“一高”者门庭若市,成为当时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的首选。五校的入学门槛很高,“一高”更高。一场入学考试下来,考上者寥寥无几。根据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吕顺长的统计,1909年参加“一高”考试者428人,录取者为50人,合格率为11.68%,竞争之激烈完全不亚于现在东京大学之类的名牌入学考试。在这种情况下,尽量多报考几家学校或者名落孙山也就司空见惯了,如郁达夫在投考“一高”之前,也在1914年3月投考过千叶医专,结果铩羽而归;张资平同年3月投考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也没成功。为了能过关,有些留学生甚至对专业都忽略不计。张资平说:“那时候,留学生只想获得官费,对于专业是否适合自己的志趣,却罕有人加以注意。”学医的郭沫若,学经济的郁达夫最终都走上了文学道路,现在看来不免有为当时现实所迫之嫌。

(三)“一高”特设预科

第一高等学校早在1899年9月就受日本外务省委托接收了浙江巡抚和南洋公派的8名留学生作为听讲生(旁听生),这是日本公立学校正式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开始。但是,“一高”制度性接收中国留学生始于“五校特约”,随之为进入高等学校本科的留学生进行日语和中学各学科教育的“一高”特设预科应运而生,每年招收50名左右中国留学生。经过一年预备教育后,学生被分到日本全国的第一到第八官立高等

学校,再经过三年的高等学校教育后,升入帝国大学。从高等学校到帝国大学这样一条培养日本正统学历精英的大门开始面向中国留学生开放,奠定了中国留学精英的成长之路。

特设预科第一次入学考试一般在每年4月。考试科目和内容是日语读写会话作文、数学、英日语翻译。能过关者一般都是已在日本宏文学院和东京同文书院等学校学习了2年左右的留学生。当时,东京一高为中国留学生设置的考试科目为第一天上午两场,各2小时,分别考日文听写作文和日语会话。第二天上午一场4小时,考“数学:算术、代数、几何”,下午一场2小时,考英语,日译英、英译日(考生也可以自选考德语、法语)。过关者,根据拟报考高等学校专业分两组:第一部(法科、文科等)为一组,教授伦理、日语、汉文、英文、德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博物、体操;第二部(工科、理科、农科等)和第三部(医科)为一组,教授伦理、日语、汉文、英文、德语、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图画、体操。起初,“一高”任课老师都是从其他学校临时雇佣,为了便于老师协调时间,上课时间一般安排在下午(上午老师在其他学校上课)。最初学制为1年3个月,1909年开始改为1年。“一高”特设预科一周六天安排32节课(4节英语、3节德语、6节日语、3节历史、3节体操、2节伦理、2节物理、2节化学、4节数学),下午课程基本排满(见表1)。二部、三部课程安排也与之差不多,只是个别课程设置稍有不同。

表 1 第一高等特设预科一部课程表(根据日文版修改)^[9]

时限/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8-9				博物		
9-10		英语				
10-11	英语	体操		德语		
11-12	历史	历史	日语	伦理	物理	物理
13-14	数学	化学	日语	化学	伦理	历史
14-15	数学	日语	数学	体操		日语
15-16	体操	日语	德语	日语	英语	数学
16-17	德语		英语			

严格来说,特设预科并非高等学校正式编制,只是为留学生一年后入学时能跟上日本学生的预备教育,所以没有特设预科规程。它大体上是按以下流程来实施。每年二月,清政府(后来中华民国)公使馆留学生监督处面向在日中国留学生募集志愿,学生提交带照片的履历书后转给“一高”;三月初,“一高”确定考试日期进行考试(英语、日语三部考试内容相同;数学一部考算数几何代数,二三部只考初步三角;一部考地理历史,二部三部考物理化学);根据考试成绩一二三部各录取约 50 名;入学后,预科学生每日上课时间主要安排在“一高”学生下课后的下午;4-7 月是第一学期,9-12 月是第二学期,次年 1-3 月是第三学期。

彭康从 1918 年秋怀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赤子之心踏上了赴日的旅程,到从约五百人的留日学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一高”特设预科之前,近两年时间的行迹目前缺乏资料可考。大正十三年(1924 年),彭康提交给京都帝国大学的入学志愿书中写道:“大正七

年十月(1918 年 10 月)至大正九年九月(1920 年 9 月),日本(留学)”,并没有具体留学地点和学习内容。根据其他同期留日人员情况,可以判断彭康很可能亦在类似于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备考。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日后关于备考“一高”拼命学习的回忆看,彭康在留日近两年后考入“一高”特设预科背后肯定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此外,进入“一高”特设预科的中国留学生功课压力很大,从表 1 的课程表可窥见一斑,对一个外国留学生来说,每周三四十节课,还要应付日德英三门外语,其学习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而且,预科仅代表一只脚踏入了高等学校,要进入高等学校还得通过第二年的考试。进入特设预科的部分留学生亦有因考试不合格而最终掉队者。更重要的是,留学生最终留在“一高”还是被分到其他高等学校,全凭考试成绩决定,根据就各年度日本《文部省年报》的录取人数表 2 情况可见其竞争之激烈。

日后创造社创始成员郁达夫 1914 年考入“一高”第一部预科(该年第一部

预科招了总共 20 名中国留学生);同年 7 月底,郭沫若(时名郭开贞)考入第三部预科,张资平考入第二部预科;郑伯奇是 1918 年考入“一高”特设预科一部,同期还有带彭康留日的李隆等。1920 年高等学校特设预科改制,原来的三部(一部法学/政治学/文学;二部工学/理学/农学/药学;三部医学)1921 年始改为文科甲/乙/丙类、理科甲/乙类。所以,彭康考入的是“一高”特设预科文科,与他同期进入“一高”的是四川的李初梨和浙江的朱镜我。这样创造社前后期的人马基本凑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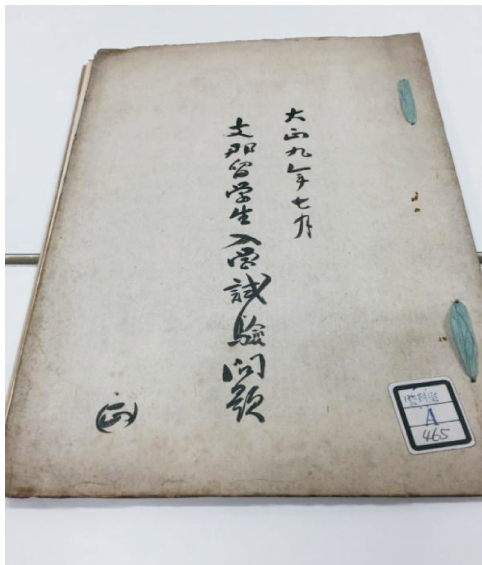


图 1 东京大学收藏的彭康当年一高特设预科入学考试题
(西安交通大学日本校友会名誉会长张书明提供)

表 2 一高特设预科各年度报考
志愿者和录取人数统计

年度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志愿者	216	542	488	418	339
入学者	49	50	50	50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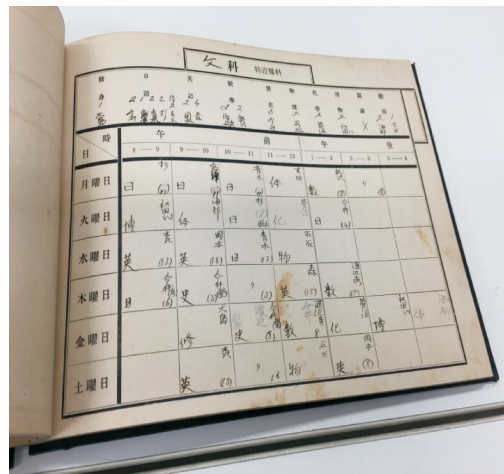


图 2 东京大学收藏的彭康当年一高特设预科文科课程表
(西安交通大学日本校友会名誉会长张书明提供)

1918 年 7 月 1 日,“一高”开始给特设预科学生颁发修了证书。1921 年(大正十年)4 月“一高”特设预科修了生共 50 名,其中文科 20 名,彭坚(康)和李初梨、朱镜我(德安)名列其中(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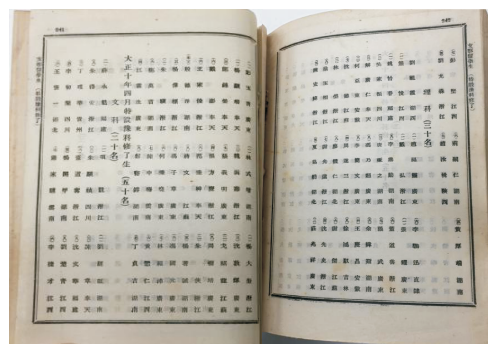


图 3 东京大学收藏的 1921 年一高特设预科文科修了生,左上角为彭坚(康)
(西安交通大学日本校友会名誉会长张书明提供)

1909年6月,经日本文部省和清政府公使馆留学生监督处商量决定,原则上“一高”特设预科修了生根据“本人的希望和學校设备状况”分到第一至第八高等学校,进入高等学校本科一年级。但实际上,各高等学校因地域远近及风格差异,无法完全按本人希望执行。东京的“一高”、京都的“三高”是大部分留学生的理想之所。后来设立的鹿儿岛的“七高”在日本本土最南端,地域偏远,加之附近已有熊本的“五高”,生源比较紧张。为了保证生源,1908年开始,“七高”连续3年把入学考试放在东京,并把考试日期提前1个半月。这样,学校知名度慢慢提高,生源紧张问题随之逐渐缓解。据1915年“一高”特设预科修了生的郭沫若回忆,当时分配方法是按特设预科修了考试综合成绩排定顺序,分别进入第一到第八高等学校。如第一、九位到“一高”,第二、十位到“二高”……这样循环排序分配。1919年9月,根据新发布的高等学校令,原来的大学预科三部制改成文理科制,因此“一高”特设预科的学科课程也有所调整,主要是去掉德语,文理都加上博物,文科加入自然科学系的科目。

1910年至1920年,在经历了大正时期的短暂繁荣之后,日本国际国内矛盾重重。1918年4月初有消息说日本准备与北洋政府共同出兵西伯利亚镇压俄国革命;5月初,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四处抗议,遭日本军警镇压,留日学生一面派代表到京沪动员学生,同时又有数百人归国抗议,到北

京的留学生和北京学生联合组织了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5月16日,北洋政府段祺瑞不顾国人反对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答应出兵镇压俄国革命。1918年8月,日本爆发了“米骚动”,全国33个县暴动。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思潮得到更广泛传播。原来抱定志愿到亚洲惟一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日本寻找救国良方的留日学生们,突然发现日本社会矛盾重重,由此他们开始新的思考。周恩来就是这时开始阅读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杂志,从1919年起,他便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的热心读者,在河上肇编辑的半月刊《社会问题研究》的影响下,周恩来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客观讲,这并非当时留日学生的个别现象,如1918年春再度赴日留学第一高等学校理科的李达在报纸上得知十月革命消息后慢慢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目前没有确切资料证明,彭康究竟是进入“一高”特设预科之前,还是在此学习期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据同时期在“一高”学习的学生回忆,在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书其实还很少,大概只有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在悄悄流传。但英语德语的书却很容易到手,东京帝国大学所在的本乡小书店可以买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德语英语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和前苏联政治家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ABC》。对于英语

功底扎实,且在“一高”特设预科学习德语的彭康而言,要想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非难事。同期的留日学生想要选择清静的地方,故要求分到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不知是否出于同样原因,彭康也被分到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文科乙类。

(四)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

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是1901年在鹿儿岛县设立的第七所官立旧制高等学校。鹿儿岛县即是曾吞并琉球王国的萨摩藩。该地民风彪悍,曾出过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东乡平八郎、大山岩、黑田清隆、森有礼等明治维新前后影响日本历史的大人物,且一直掌控着日本海军。早在“七高”筹备设立之初,对于选址问题,新泻和长野两地曾竞争激烈,结果因为旧藩主岛津家的全力支持和萨摩政治家的背后强大影响,鹿儿岛渔翁得利拿下了第七所高等学校的创办许可。第七高等学校校名中的“造士馆”,是原来藩主岛津家设立藩校的名字,第七高等学校建立时公爵岛津忠重为表示继承其祖父遗志捐了2万6千日元。所以第七高等学校总有岛津家族的影子和原来藩校传统。“七高”建在鹤丸城遗迹,背靠城山,对面就是樱岛,樱岛朝霞、矶滨夕照等都是很不错的景致。这里没有东京大阪那样大都市的繁华喧闹,是个学习的好地方。以第一高等学校为代表的旧制高等学校,是参考德国的教育制度等而建立,不仅非常重视外语(特别是德语),教养主义^①和青春小说也很流行,以致于对“生徒”的传统称呼也变成了“学生”。高等学校实行

寄宿制,由学生自己管理,注重学生自由自主方针的笼城主义贯穿始终。分散在各县的高等学校一般是继承了本地著名藩校而建立,因此会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如“七高”的名字后面所带的藩校“造士馆”就知道其传承和地方特色。

从创校到1950年(昭和25年)3月31日废除,“七高”总共招收约1.1万名学生,其中约140名是亚洲留学生,一半左右来自中国,基本上每年都有2至4名江西省留学生在鹿儿岛学习。1921年4月,彭康以文科第六名的成绩,考入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同期另有9名中国留学生入读,加上二三年级留学生总共21名。彭康被编在文科乙组,德语是第一外语,同时兼修英语,不过,此时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已经相当好,一天可读100页上下的英文小说。在“七高”学习的三年中,彭康学习了哲学、历史、伦理学、日本文学等课程,尤其是每周一半以上时间的语言学习,使他掌握了日、英、德语,为他日后译著马列著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京都帝国大学

(一)时代背景

拿着官费进入日本条件和教育质量都是最好的帝国大学学习,是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最大梦想。但从高等学校到帝国大学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06年清政府通过驻日清国公使馆向日本文部省提出:(1)每年高等学校选拔30人入学;(2)高等学校毕业的清国留学生由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

情况不允许的话京都帝国大学)接收。以每年30人,6人一组各入法、医、工、理、农、科五科大学学习。对于文部省的探询,东京帝国大学审议会以“本邦入学志愿者都无法满足和收容的现今状态不能特约清国人”拒绝。“一高”设立特设预科后,因为新设了东北帝国大学和九州帝国大学可接收留学生,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也因此生源得以分流,有了接收留学生的可能。两校分别在1908年12月和1909年2月回答文部省可以开始接收留学生。因为大正年间帝国大学接收能力超过每年毕业的高等学校学生数,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没有特殊情况的话,通过“一高”特设预科入学考试就等于能从帝国大学毕业了。

京都帝国大学是继东京大学后1897年设立的日本第二个国立大学,它是1895年由时任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提案用中日甲午战争赔款把第三高等学校升格而成的,与培养权威主义的社会精英或官僚的东京帝国大学灌输式授课不同,它标榜“自由的学风”,并以德国的大学教育为模型,重视演习和毕业论文的独特教育方法。最初担任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很多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并有德国大学学习经历者,比如以高根义人等4人为首的“柏林党”。他们带回来的不是“大学和国家”,而是“国家和学问”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法学教育方法是除去法学和政治学的壁垒,导入seminar(研讨会)制、毕业论文,采用科目制代替学年制、可自

由选择科目等。

当时,日本正处在一战胜利后的大正向昭和过渡期,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但另一方面,因为通货紧缩,进入工厂的劳动大军增加的同时劳动人民生活并没有改善,劳动争议不断。由此导致思想界也慢慢开始发生变化,1916年吉野作造提倡民本主义;1917年河上肇《贫乏物语》刊行(大阪朝日新闻1916年连载);之后1918年发生“米骚动”;1919年,三木发刊《改造》《我等》杂志,河上肇创刊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1920年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学部诞生,同时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和协调会也在同年成立。这是日本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民众和知识分子社会认识的过程,也是自觉开始思考社会问题过程。

此时,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高等学校最初如“文明的配电板”完全被欧化主义熏陶,学校里人道主义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等激进思想风暴铺天盖地。因为俄国革命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长期遍历各种学问思想后,认为马克思主义《资本论》是最终至上的真理,他在1927年把《经济学大纲(上)》(改造社)作为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义公开发行。在序文里他说自己每年都改写经济原论讲义笔记,近几年已经没有改的余地,“即使被放在火上烤”也不会改变立场。河上肇并不是特例,除了年轻的经济学者滔滔不绝倾心于马克思主义外,帝国大学教授

(大森义太郎、向坂逸郎、有泽广巳、山田盛太郎、石浜知行、平野义太郎)在讲台上公开讲马克思主义,这被文部省和议会当做大问题提出来也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大特色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布哈林、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著作被先后翻译成日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出版,高畠翻译的《资本论》甚至成为畅销书。

如前所述,最初在日本,马克思主义书籍杂志除《共产党宣言》外还不多,不过英语德语的马列主义原版书在大学周边的小书店却很容易买到。1922年进东京帝国大学的曾任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的志贺义雄回忆,“当时的热血青年都爱不释手把《共产主义 ABC》读到破烂不堪才罢休。我找了一下,找到了破破烂烂的用线穿起来的,那是高畠素之的《资本论》译本(1924年译完)刚面世,我想对很多青年来说各种思想学问在马克思主义面前一下子黯然失色了吧。”生活在当时亚洲唯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青年尚且如此,国内军阀混战连连,那些和彭康一样怀着满腔热情和抱负负笈东渡寻找救国良方的留日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就更加倾心了。

日本国内的这种思潮,在留日学生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就是在翻译河上肇的著作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在给成仿吾的信里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的就是它,把我从歧路彷徨里引出了的就是它,把我从死的

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4],郭沫若就此彻底弃医从文。李大钊通过其同学陈溥贤的长篇通讯《东游随感录》介绍的河上肇主编的《社会问题研究》等社会主义刊物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1919年5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外,周恩来、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都深受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据三田刚史的统计整理,早在明治三十八(1905)年就有中国留学生朱献文等4名(法律学科)和蒋履曾(医科大学)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这就是京都帝国大学中国留学生历史的开始。此后随着日本大学扩大招生和留日学生的增加,到1924年彭康入学时,一起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的竟然有45名之多。

1925年(大正14年)12月,发生京都“学联”事件,京都帝国大学和同志社大学等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被镇压肃清。日本内地开始首次启用治安维持法。1926年1月15日,在东京检事局平田勲等指挥下,停止相关报道后在以后的4个月里动员各府县警察部特高课在日本全国范围检举社研会(主要是由大学组成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成员。搜查了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山本宣治、河野密、关西学院的河上丈太郎、新明正道等教员家。被检举的学生中38名被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及出版法、不敬罪起诉。1926年6月29日,冈田良平文部大臣首次因此事件影响发出禁止学生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通知,1928

年4月17日发出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解散命令,此后也发布了各帝大社研解散命令。在这种环境下,东大新人会1929年11月7日宣布解散。

(二)学习情况

京都帝国大学的几个江西同乡蒋思道、熊恢等都很活跃,还有的同学经常进行演讲。1924年4月,彭康离开鹿儿岛,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学习。和他同年一起进入京都帝国大学还有文学部的李初梨和冯乃超,以及法学部法律科的张有枢。另外,创造社早期前辈郑伯奇(文学部)、后来成为西北医学院院长的中国生理学奠基人侯宗濂(医学部专修科博士)1922年已经入学。为很多年轻学子追捧的河上肇教授担当的课程有经济学史、英经济书购读、(法学部,政治科必修;农学部,农业经济学科必修)经济原论;之后1925年、1927年河上肇又担当经济原论;1926年,担当经济学史、经济演习。很多留日学生就是奔着河上肇而去的,进了京大不上他的课当然有些不合逻辑了。以当时河上肇的名气和对年轻学生的吸引力,之前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接触的彭康,在李初梨等人的劝诱下或自己主动选修河上肇的课也是很自然不过的。

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1907年开课,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慢慢成熟。哲学科有哲学、哲学史第一(哲学西洋哲学史)、哲学史第二(印度哲学史)、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教授法总共5

个讲座,社会学讲座和宗教学讲座作为哲学科1讲座在第2年开设。最早教授的是同志社普通学校高等科教授米田庄太郎(1873-1945)。米田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除了介绍欧美社会学说和社会思想,也很关注当时风俗和社会问题、社会运动,并把相关分析成书出版,著作颇丰,是日本社会学界的标杆性人物。大正13年(1924年)12月,米田在还有3个月就退休时突然辞职,据说是因为文学部教授会部分人对他的被差别部落出身有偏见。后来的社会学特殊讲义和演习由藤井健次郎、西田几多郎担任。上课一般由户田贞三、三浦新七、今井時郎、岩崎卯一等来。文学部的教授像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等都是后来在学术界声名遐迩的“京都学派”^②的代表人物。

在这自由又专业的环境下,彭康系统研习了哲学、史学、语言、美术等基础课程,将三年内应修的18门课程,于两年内全部修完,并大量阅读了日文所译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和杂志。创造社同人郑伯奇、冯乃超、李初梨、李铁生均曾于此时在京都大学求学。他们在校园内学习马克思主义,相互影响,寻求救国真理;又一同走出校园参加“反对日本干涉中国”的抗议活动,在学习与实践斗争中,从思想上走出唯心论哲学的圈子,向唯物论哲学迈进,从朴素的爱国主义逐渐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些都为他日后回国投入“革命文学”论战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表 3 大正 7 年(1918 年)大学令后文学部的讲座和担当老师

文学部	讲座	担当老师
国文学、国文学	一讲座	沢泄久孝、藤井乙男、吉沢义则
国史学	二讲座	喜田贞吉、西田直二郎(史学)、三浦周行
史学、地理学	三讲座	石桥五郎(地理学)、小川琢治(史学地理学)、坂口昂(史学)、原胜郎(史学)
考古学	一讲座	浜田耕作
东洋史学	三讲座	桑原隲藏、内藤虎次郎、羽田亨(言语学)、矢野仁一
哲学、哲学史	四讲座	小岛祐马、沢村専太郎(美术史)、高瀬武次郎、田边元(哲学)、朝永三十郎(西洋哲学史)、西田几多郎(哲学)、松本文三郎
心理学	一讲座	野上俊夫
宗教学	一讲座	波多野精一(哲学)
社会学	一讲座	米田庄太郎
教育学、教授法	一讲座	小西重直
伦理学	一讲座	藤井健治郎
美学、美术史	二讲座	植田寿藏(美学美术史)、深田康算
支那语学、支那文学	一讲座	狩野直喜(东洋哲学)、铃木虎雄(汉学)
西洋文学	二讲座	石田宪次(英文学)、田中秀央、太宰施门、成瀬清、藤代祯辅
言语学	一讲座	新村出
梵语学、梵文学	一讲座	榊亮三郎

注:根据京都大学大学文书馆教师信息制作,另有今西竜(朝鲜史)植村清之助(西洋史)

大正 13 年(1924 年)5 月末文部省普通学务局做的官公私立大学专门学校中国留学生现状调查情况中显示(见图 4),按“学科别 学年别 种别 出身省 男女别 入学前学历 官公私费 前学年 学业成绩 前学年出席情况 毕业预定 年月 性格 氏名 年龄备考”,统计了当

时日本全国 64 所官公私立大学专门学校在籍的中国留学生基本情况。各项评价根据学校不同,评语各有不同。京都帝国大学的部分里,“前学年学业成绩”大致有“良”“乙”“不详”“及”“落”等评价。“前学年出席情况”有“勤勉”“不明”“不详”“未出席”。而“性格”里有“良”

“普通”“不明”。刚进入文学部哲学科的彭康(当时使用学名“彭坚”)的“前学年学业成绩”为“及”(及格)，“前学年出席情况”为“勤勉”，“卒业预定年月”为“大正十六年三月”，“性格”为“不明”。和前面的同学李初梨的评价几乎一模一样。对于刚进学校没多久的一年级新生，这样的评价应该都是中规中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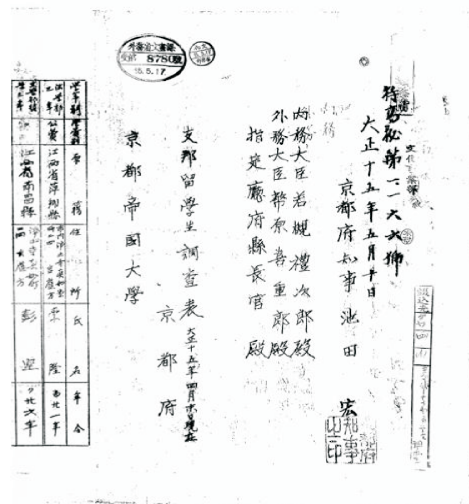
(三)住宿情况

关于彭康在京都帝国大学时期的住宿情况,在京都帝国大学著名的吉田寮等处资料里并没有看到彭坚(康)相关记录。据大正十五年(1926年)6月30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调查报告,当时文学部12名中国留学生,10名“普通民居同居者”,2名“营业下宿^③”。据此推测,彭康应该是和几个中国同学一

起在外面居住,由于他们都在文学部,故郑伯奇回忆表示“几乎朝夕相见”。另外,大正15年(1926年)5月10日京都府知事池田宏给内务大臣若槻礼次郎、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指定厅府县长官提交的中国留学生调查表中里有一条“彭坚”的记录(图5)。住所是“净土寺真如町二四吉庐方”,而带他来日本李隆的住所是附近的“市内净土寺真如堂町二四吉庐方”,虽然住址一字“堂”之差不同,却是同一个房东。据查,“京都市净土寺真如町二四”这个地址现在还在,只是有了新房子。但并没有“真如堂町”这个地址。合理推断,当时李隆和彭坚(康)住的是同一个地方,只是李隆笔误写错了。

京都帝国大学		大正十五年(1926年)6月30日	
学部	姓名	籍贯	入学年月
文学部	彭康	江西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李初梨	四川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江聖達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張運科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洪瑞榮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傅書逸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繆祖望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朱伏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許世塘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魏岳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姚岳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余禔斯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鄭裕鏞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文部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陳東直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方國仁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劉均衡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鄭錦棠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黃東哲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全華錦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吳和宜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高凌英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劉作權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張昌熙	浙江	大正十五年
文学部	陳華燦	浙江	大正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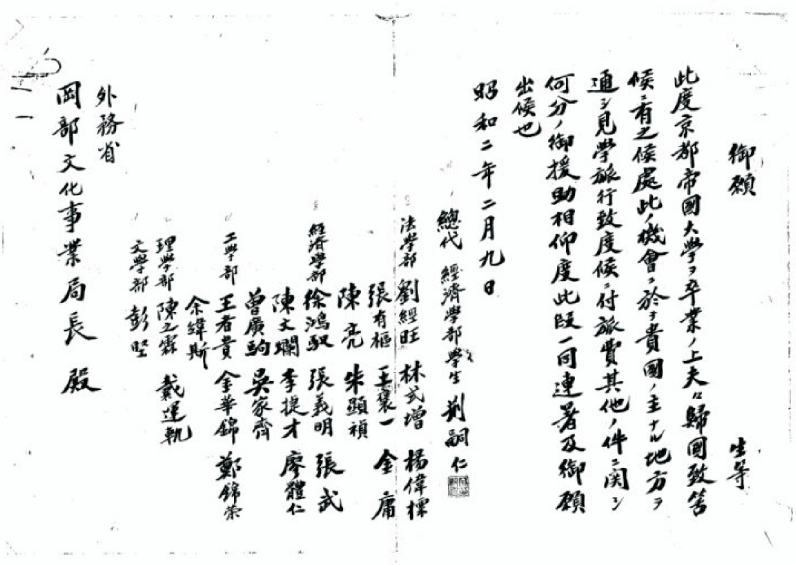
图4 京都帝国大学在校中国留学生情况一览表(部分)



0180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http://www.jahrc.jp/

图5 中国留学生调查表京都帝国大学(部分),左侧为彭坚(康)住址(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



H-0620

0043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Japan Center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http://www.jahrc.jp/

图6 京都帝国大学向外务省冈部文化事业局长提交的给即将毕业学生安排见学旅行的申请(文学部 彭坚)(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

他们的住处靠近四季分明,名胜真如堂,到世界遗产银阁寺、京都大学都是步行圈的距离,这对于留学生无疑是很理想的居住环境。

(四)见学旅行

1927年2月,彭康参加了23名预计3月毕业的京都帝国大学中国留学生的见学旅行(图6)。指导老师是后来与鲁迅有交往的学生监事事务嘱托绢笠佐一郎,总代是经济学部荆嗣仁(后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长沙分会负责人),法学部张有枢也在内,文学部只有彭坚(康)一人。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给经费(每位学生100日元。日本当时为了笼络人心,设立了一个东方文化事业^④特别预算)。整个旅程历时两周,从京都出发到东京、上野、日光、上野、东京、名古屋、二见、三田、京都、神户、别府、小仓、门司、下关、宫岛、京都,遍历了日本本州、九州大部分地方。3月23日他们一部分到东京,24日张有枢等4人去了日光,25日绢笠监督带彭康等4人去了箱根。他们这次旅行沿途参观了理化学研究所、大众院、帝国议会、名古屋离宫、爱知县商品陈列所、神户税关、川崎造船所、京都帝国大学地球物理学研究所、八幡制铁所、东亚博览会等。这次旅行所到之处,大致是彭康留日求学过程中都经过的。能够参观理化学研究所、议会、川崎造船所等日本著名企业和政府机构,对彭康等留学生而言是一次全新体验,也是他们期望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重要历程。

此外,行程还安排了3月30日参加京都帝国大学毕业仪式。目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1927年发布的关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和学位授予相关

的官报总共有10次。其中,5月3日的官报里学事部分“卒業并学士試験合格证书授予京都帝国大学(文部省)”里报道了3月30日京都帝国大学卒業并学士試験合格证书授予名单,与彭康一起出游的法学部张有枢,经济学部荆嗣仁等大部分人都名列其中却只是不见彭坚(康)名列其中。

究其原因,在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血雨腥风弥漫九州。同年7月,国民党政府突击检查创造社出版部。10月,创造社发起人之一的成仿吾亲赴日本,动员冯乃超、彭康等热血青年回国参加斗争。这正是彭康早已向往的。此时他已完成毕业论文,尚未毕业,毅然放弃学位、毕业证书,于11月下旬与冯乃超、李初黎、朱镜我、李铁声等一同回到白色恐怖中的上海。^⑤正是带着在日本留学期间学到的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新武器,他们这批创造社后期同人一回国就以初生牛犊的勇气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留下了他们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五、结语

1918年,彭康留学日本,1920年考入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1921年到鹿儿岛县的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学习,1924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走的是战前留日精英成长之路,也正是这段求学过程,彭康经历了二战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萌芽、发展、消亡的过程。与此同时,他留学的京都帝国大学正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发源地和后来被弹压的暴风中心。

1918年开始东京帝国大学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团体新人会,1920年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社会主义运动)建立,1922年日本全国水平社成立(部落解放运动)、日本农民组合(农民运动)以及日本共产党成立;到1923关东大地震后朝鲜人、华人被虐杀,“龟户事件”(军队杀害劳动运动家川合义虎等人)和“甘粕事件”(宪兵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人);再到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开始实施,社会主义、劳动运动、自由主义等开始被弹压。这一系列事件让他兴奋、迷茫、愤怒、沮丧,但也正是在这种快乐与痛苦的成长和求学过程中,他偶遇了马克思主义也偶遇了西方哲学和东方思想形成的“京都学派”。中学学习的英语,来日后学习的日语,加上“一高”特设预科开始学习的德语以及在学校里的学习的欧美文学课程,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的窗。就这样,在有意无意间,他找到了“革命文学”这个武器,完成了一个江西萍乡中学生到带着革命理想的留日学生的升华。至1927年回到祖国,他投身革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即使身陷囹圄,亦不改初心,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助学。1952年9月,教育部提名彭康任交通大学校长,同年11月,毛主席签发任命书;1955年,带领交通大学西迁,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贡献毕生精力。

注:

①教养主义:根据时代不同有不同定义,这里是指注重尊重古典和重视学问的生活方式,并通过学问等养成好的素养的态度。

②京都学派:有哲学、近代经济学、

宪法学、精神医学的京都学派。不过,一般指以京都大学的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教授以及他们的弟子为中心组成的哲哲学学派。京都大学附近现在还有京都学派大师们经常散步思考的“哲学之道”。

③下宿:日本以前个人经营的一般提供早晚饭(也不可要),洗澡间、洗衣室、厕所灯共用,还配管理员的宿舍一样的住房。有些还有几点关门等门限。现在比较少了。

④东方文化事业,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和中国共同运营的文化事业的总称。192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缓和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1923年开始外务省管辖的利用庚款实施的“东方文化事业”。1923年12月29日—1924年1月8日经过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出渊胜次和驻日公使汪荣宝(1903年留日南洋公学学生)多次非正式协商。就实施该日中共同文化事业达成共识(汪·出渊协定)。不过,该事业虽也有部分亲华的影子,日方主要是想以此培养“亲日派”,所以没有把使用权给中方。1928年中日关系恶化,中方退出运营,这就成了日本单方面的行为。事业内容除给在中国的日系各团体提供社会活动资金援助、促进中日间交换留学、还有其中心任务设立和运营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东方文化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随着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方文化事业”最终演变成了日本侵华的文化工具。

参考文献

[1]彭城.怀念敬爱的父亲彭康同志.
<https://pksy.xjtu.edu.cn/>

info/1104/1151.htm.

[2] 严平. 近代中国留学日本大学预科研究——以“五校特约”为中心[J]. 清史研究, 2012, (04): 53-62.

[3] 第一高等学校《第一高等学校六十年史》1939年3月, P502-503.

[4] 郭沫若《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183页.

[5] 陆根书, 龚诞申, 王文生, 贾箭鸣. 彭康教育思想与实践述略. <http://xszx.xjtu.edu.cn/info/1005/1204.htm>.

[6] 霍有光 彭城编撰《彭康年谱》2009.6.

[7] 丁伟: 揭秘中共创党时期旅日支部被破坏始末. <http://roll.sohu.com/20120706/n347489167.shtml>

[8] 罗以民《天涯孤舟: 郁达夫传》九州出版社, 2004.3.

[9] (东亚历史资料中心, 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所藏) 1922年, “五校特约”期满件名标题(日本語): 5. 十三年五月 分割1階層: 外務省外交史料馆>战前期外務省記録>H門 東方文化事業>5類 学費補給、諸補給>0項>0目>在本邦留学生關係應件 第三卷(11/112) B05015397900. (东亚历史资料中心, 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所藏) 件名标题(日本語): 2. 京都帝国大学 階層: 外務省外交史料馆>战前期外務省記録>H門 東方文化事業>6類 講演、視察及助成>1項 講演、視察>0目>在本邦留学生本邦見学旅行关系杂件/補助实施关系 第一卷(东亚历史资料中心, 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所藏) 件名标题(日本語): 2. 階層: 外務省外交史料馆>战前期外務省記録>H門 東方

文化事業>5類 学費補給、諸補給>0項>0目>在本邦留学生关系杂件第一卷.

[10] 官報. 1924年03月27日目次: 彙報 / - / - / 卒業證書授與第七高等學校造七館、金澤高等工業學校(内務省、文部省).

[11] 官報. 1924年06月04日目次: 彙報 / - / - / 學生宣誓式京都帝國大學(文部省).

[12] 官報. 1927年05月03日目次: 彙報 / - / - / 卒業立學士試驗合格證書授與京都帝國大學(文部省).

[13] 第一高等学校一覽. 自大正元年至2年-自大正10年至11年.

[14] 《卒業生氏名》第一高等学校, 昭和11(1936年).

[15] 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館一覽. 大正10年度.

[16] 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館一覽. 大正11年度.

[17] 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館一覽. 大正12年度.

[18] 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館一覽. 大正13年度.

[19] 京都帝国大学一覽. 自大正13年至大正14年.

[20] 京都帝国大学一覽. 自大正14年至大正15年.

[21] 京都帝国大学一覽. 大正15年至昭和2年.

[22] 三田剛史(著)《甦る河上肇—近代中国の知の源泉》藤原书店, 2003.1.

[23] 荫山雅博《明治日本与中国留学生教育》雄山社, 2016.3.

[24] 中村隆英《昭和史》(上)东洋经济新闻社.

[25] 京都大学网站(社会学教室小史).<http://www.socio.kyoto-u.ac.jp/about/history/>.

[26] 旧制高等学校教育の終焉.
http://ci.nii.ac.jp/els/contentscinii_20171114150725.pdf?id=ART0000863985.

[27] 旧制高等学校生徒の精神形成史研究—第一高等学校『校友会雑誌』を手がかりに—. http://w3.waseda.jp/prj-j-kyouikusi/wp-content/uploads/sites/106/2016/11/ilovepdf_com-49-56.pdf.

[28] 河上肇と中国の政治経済学
https://repository.kulib.kyoto-u.ac.jp/dspace/bitstream/2433/39628/1/0-3_6.pdf.

[29] 夏目贤一《第一高等学校における留学生教育の再編と日中関係》
<http://www.u-tokyo.ac.jp/content/400005509.pdf>.

[30] 韓立冬《五校特約》下の一高特設予科—修了者の進路を中心に—.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15916548.pdf>.

[31] 高明珠《中華民国期の高等教育分野における留学生政策—「庚款留学生」と「五校特約生」との比較研究》.

[32] 第一高等学校特設予科時代の郭沫若—「五校特約」下の東京留學生活—. <http://human.kanagawa-u.ac.jp/kenkyu/publ/pdf/syoho/no52/5210.pdf>.

[33] 特設予科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受け入れに関する考察—明治専門学校を中心として—. <http://>

catalog.lib.kyushu-u.ac.jp/handle/2324/1031/KJ00000703257-00001.pdf.

[34] 旧制高校からみた「青春」概念の形成. <http://publications.nichibun.ac.jp/region/d/SH/series/kosh/2013-11-29/s001/s030/pdf/article.pdf>.

[35] 1920年代におけるマルクス主義の受容と社会科学文献. <http://oohara.mt.tama.hosei.ac.jp/oz/617/617-04.pdf>.

[36] 陳公博と周仏海はなぜ汪精衛政—に参加した. https://m-repo.lib.meiji.ac.jp/dspace/bitstream/10291/16622/1/seikeiro_nso_82_5-6_77.pdf.

[37] 京都大学大学図書館(京都大学歴代代总长/教授/助教授履歴検索システム—対象:1949年以前在职者—). <https://kensaku.kual.archives.kyoto-u.ac.jp/rireki/>.

[38] (京都大学大学図書館收藏)《大正十三年入学愿书 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大正十三年一月四日入学关系書類》;《大正十五年四月关于学生生徒書類》.

作者

郑海洋 西安交通大学日本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97级计算机毕业生